

从与胡适的交往中看民国报人程沧波

史坦国际STANCHINA

林建刚

作为一九四九年之后离开大陆的国民党大员，程沧波的名字并不为人熟悉。但在民国时期，作为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的社长，程沧波却是显赫一时的人物。作为接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开明的国民党党员，他与胡适之间可以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从胡适对他的评价及与其交往中，我们似乎可以穿越时空隧道，看出程沧波的面影。

民国时期许多报人是江浙人，程沧波也是其中之一，他于1903出生于江苏武进。其父亲极为重视教育，程沧波在幼年时期便被送入了私塾并接受了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之后，他进入当时第一流的教会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在圣约翰大学呆了两年之后，程沧波又转学到了复旦大学。

如果说幼时的私塾教育为程沧波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古文功底，那么，在圣约翰大学及复旦大学的学习则不仅为他后来留学英伦打下了外文基础，并且启发了其日后开明、自由的思想。程沧波曾回忆说：“在民国十三年前，在上海认真读文科的学生，其选择只有圣约翰或复旦。这两个学校平时互相转学的学生尤多，本人也是从圣约翰转到复旦的一个。从自身的亲历，觉得圣约翰读书实在认真，图书仪器实在完备。而复旦学生的活动精神与能力，确是惊人。复旦师生间的政治意识，开朗而发达。当时颇有识力过人的家长，曾经说过：最好送子弟先在圣约翰读两年或三年，再到复旦读一年或两年，然后到外国去留学。”

程沧波一直以毕业于复旦大学而骄傲。他在《复旦大学》一文中曾回忆道：“我曾将校歌中‘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这三句话，反复讲述。复旦五十年的历史，建筑在这三个特点。这三个特点，就是近代西方文明的精华，也就是自由世界与共产世界的分水岭。”

复旦毕业之后，程沧波曾在国内担任上海《时事报》主笔，但不久就去英国留学了。在英国，程沧波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是拉斯基的学生。在民国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有许多都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拉斯基的学生，比如罗隆基、储安平等等。但是，不同于罗隆基的选择，程沧波在其青壮年时代就加入了国民党，成为国民党中颇有前途的政治明星。胡适在1937年7月30日的日记中曾写道：“到高宗武家吃饭，在座的有萧同兹、程沧波、裴复恒。此皆南京之青年智囊团也！”

加入国民党的程沧波，一边受到党的组织纪律的约束，与此同时，大学以及留学时期所奠定的价值观也在隐隐地发挥着作用，这就导致他与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之间一边是剑拔弩张的论敌，一边又是惺惺相惜的朋友的关系。

胡适在日记中第一次提到程沧波是在1929年胡适与国民党就“人权与约法”问题论战时期。在1929年8月27日的日记中，胡适写道：“《时事新报》程沧波先生的社评，载在下页，是前夜在俞大维家中吃饭时杨杏佛出的主意，杏佛的意思是要他指出我的主张极平常，没有干涉的必要。但文中不妨指驳我的一部分的话。今天我见了此文，不觉失笑。上海的舆论家真是可怜！”

胡适之所以说以程沧波为代表的报人可憐，是因为程沧波写的社论甚为勉强。在社论中，程沧波写道：“至若当政府对于言论之态度，吾人早可以于孙先生遗教中窥见其崖略。孙先生言必称王道，而对内政纲中尤规定人民集会结社言论之自由，在革命之时期如是，在统治之时期当亦如是。中国国民党之政府与党员，绝不开排斥善意之批评，更不拒绝根据事实之批评，想无得而否认者。不过批评之对象有限制，批评之动机须鉴别，此则为任何宪政国家所共悬之厉禁。”

从文中不难看出，程沧波一边说政府保障言论的自由，一边则又有明确的限定，也就是要求批评的自由必须基于好的动机。但问题在于，对于一个人的动机，我们又怎么好随意揣测呢？程沧波在这里，从某种程度上则是以“动机”的名义实施对言论的钳制。

这次论争之后，胡适在1934年还曾跟程沧波有过密切的联系与交谈。胡适之所以与他有这样密切联系，主要还是关注南京政局的发展。胡适毕竟还是希望执政的国民党能够更加进步，进而向民主宪政的道路前进。在1934年2月4日的日记中，胡适写道：“回到旅馆休息。约程沧波来谈。他谈南京政治，很有意味。他说，我只看见行政上小有进步，政治上危机很大，领袖人物多不懂政治，甚可焦虑。他对于精卫，甚不满意，其言甚可代表一部分人士的公论。他说孙哲生近来有进步，宋子文也有进步。我对他说：子文也是不懂政治的；他的毛病在于不知守法为何事。”

此后，胡适与程沧波在“西安事变”的态度上又高度一致，这也是那时知识分子对蒋介石与张学良的普遍判断。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所作所为，遭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一致谴责。胡适在1936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早我还未下楼，小三大叫：爸爸，张学良造反了。这祸真闯得不小！汉卿为人有小聪明，而根基太弱，到如今还不曾成熟，就为小人从误。今天我家中来客不断，都为此事甚焦急。蒋之重要，今日大家更明白了。”

事件发生后，作为《中央日报》社社长的程沧波曾在报纸上对张学良提出严厉批评，为此程沧波还差点辞去社长的职位。这从傅斯年给胡适的信中可以找到佐证。

两人的身份、地位及政局形势也使他们有机会密切交往，加上朋友间的惺惺相惜，他们时常谈至深夜。比如，七七事变后不久，国民党于1937年7月16日举行第一期庐山谈话会，胡适应邀于11日到庐山。而当时的《中央日报》决定在牯岭开办《中央日报》庐山版，因此程沧波也在庐山。这在胡适日记中有明确的记录。

他们在对日态度上高度一致，当时他们还是主张和平解决七七事变。其对日的姿态引起了当时人们的不解，曾被嗤之为“低调俱乐部”。对于这一时期胡适与程沧波的交往，程沧波也在《蒋总统与我》有所回忆：当时胡适之先生住在我隔壁，他不知如何知道我将起草一篇重要文稿，他跑进我房间，他说：“委员长平时的文告总嫌过长，你此次能否用三百字完成此文？”我答：“能六七百字或不超出一千字完成此文，已是吃力，三百字完成此文，我无此本事。”说完，他笑着出去，说：“不打扰你了！”程沧波回忆中所起草的文稿就是那篇著名的《告全国军民书》，内中曾有“和平未到最后关头，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的警句。

在一九四九年天地玄黄之际，胡适去了美国，而程沧波则去了台湾。后来胡适因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又回到了台湾。两人又恢复了联系。胡适在1961年1月17日中写道：“端木铸秋、程沧波约我吃饭，有朱骝先夫妇、徐培根夫妇，有画家邵幼轩（邵飘萍之孙女，画家林中之妻），有出名的蓝妮。”

这次的宴会其实颇有意味，吃饭的客人之中既有左翼诗人殷夫的哥哥徐培根，又有徐培根的妻子徐芳，而徐芳恰恰就是胡适在北大时期的学生，徐芳关于中国现代诗的论文还是在胡适指导下完成的。不仅如此，徐芳

还曾是胡适的恋人。这一时期的程沧波，创办《自由人》报，在意识形态上开始了他跟极权共产主义的思想论战。对于这一时期沉溺于《水经注》考据之中的胡适，程在心底其实是有所不满的，他认为此时的胡适未免有些太保守了，这与当时殷海光对胡适的认识是一致的。在《记傅孟真》一文中，程沧波写道：